学习“七一讲话”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术和学理的创新性研究

顾海良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习近平“七一讲话”从多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科的学术和学理研究的视域,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内在禀赋、“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和学理依循,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主题研究的境界。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不仅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特质和特征,而且还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两个“相结合”,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的科学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理依循的凝练。从两个“相结合”及其内在联系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和学理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主题”探索有着重要的学术的和学理的启迪。在学科和学术研究中,要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理论主题以及相应的思想内涵、理论创新和学术意蕴的研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论自觉;历史自觉;“两个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图分类号: A 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1)05-0005-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实现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砥砺奋进中理论成就和思想辉煌的历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对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和伟大成就作出了阐释,而且还从多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科的学术和学理研究的视域,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内在禀赋、学理依循和理论主题研究的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三史”的联系及内在禀赋

习近平提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①习近平提出的“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三史”的内在联系问题,在学科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内在禀赋及学理依循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百年社会变革和发展基本过程及其规律探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历史。在这一思想历史中,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特质,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的不懈力量,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深湛底蕴。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同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历史这“三史”相统一的内在禀赋。

马克思主义虽然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就开始传入中国,但只有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经过

收稿日期: 2021-08-10

作者简介: 顾海良,男,上海市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 年第 7 期,第 9 页。

“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才从最初的涓涓细流汇成中国社会革命的强劲的思想潮流,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决意改变中国和改变世界的思想指南。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根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和思想实质作出最初的但却是整体意义上的理解。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骤然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思潮得到广泛传播,李大钊站在这一思潮涌起的最前列。1918 年 11 月,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预言:“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①12 月,在《Bolshevism 的胜利》一文中再次提到:“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 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②“五四”运动后不久,李大钊在 1919 年 9 月和 11 月出版的《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和第 6 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上,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阶级竞争说”)和经济学说(“经济论”)作出阐释。在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阐释时,李大钊指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③凸显了李大钊是从“改造世界”上对待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是从社会主义“新纪元”意义上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变革意义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自觉油然而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在 1920 年 12 月发表的《随感录》谈到“主义与努力”问题时提到:“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因此,“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④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在 1922 年 5 月发表的《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具有“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这两大精神,“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研究马克思的学说,“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⑤ 在陈独秀看来,马克思学说不仅指出了中国社会革命的“主义制度”的方向问题,没有方向中国革命就没有出路;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学说要转化成“实际活动”,就是按照“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这就如依照“方向”去“行船”,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

1924 年 3 月,恽代英在《上海追悼列宁大会特刊》上发表的《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一文提出:要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但是至少可以说,伟大的列宁,已经亲身给了我们许多好的暗示了,我们可以不注意他么!”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在于立足“中国的情形”,寻找“中国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世界”、作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作为“解决中国的办法”等理念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开始生成的理论自觉的禀赋,在根本上就在于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生成并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革命中历

---

①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59 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第 368 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 页。

④ 《陈独秀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3 页。

⑤ 《陈独秀文集》第 2 卷,第 250 页。

⑥ 《恽代英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5—156 页。

史自觉的蔚然大观也同时生成。1919 年 8 月,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系列文章中提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 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对中华民族的“原有伟大的能力”作出的历史评价,对中华民族现实境遇所作的深刻阐释,对中华民族“改革”前景、“光明”前途、“先告成功”结果作出充满激情的阐释。青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们所具有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担当的历史自觉。

1924 年 5 月,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对这种历史自觉作了深刻的学理性阐释。李大钊提出:“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从社会发展的大历史观上看,“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②李大钊这里所说的“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指的是对马克思的“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③的“自觉”遵循。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以强烈的历史自觉,肩负起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历史担当。

历史自觉深化了对理论自觉的感悟。1920 年,毛泽东提到:“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④立足中国“这地盘内的情形”的“研究”,成为理论自觉的基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李大钊则提出:“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间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完成。”⑤李大钊提出:“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⑥李大钊对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内在联系的深湛阐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1923 年,瞿秋白根据自己在俄国亲历的新政策时期的变化,提出了“各国各有其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筑在现存的实有的基础上,所以将来会发现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或者可以说是那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之继续变革。”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根据“现存的实有的基础”,必然出现“种种‘社会主义生产’之不同形式”,也必然“暂呈互异的社会主义——各国各有其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⑦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集中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革命的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正是在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禀赋的生成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开始启动,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也得以产生。党的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深入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问题。1922 年 6 月,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

---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湘江评论》第 4 期,1919 年 8 月 4 日。

② 《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566、568 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568 页。

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4 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446 页。

⑥ 《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466 页。

⑦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51 页。

主政治为止。”①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思想;在民主主义革命的七项奋斗目标中,开头两项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② 由此萌生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历史任务的思想,即“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在同中国历史文化初步结合中“化”出的这些道理,经过之后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最后成为适合于中国具体实际需要的革命发展道路的创新理论,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一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开端,在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中,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也由此起步。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移译和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1920 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翻译和学习,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1921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提出“中央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④的紧迫要求。1922 年 6 月,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陈独秀代表党中央提出组织翻译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经典著作的要求等⑤。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必修课”,是马克思中国化历史、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历史的思想源流和理论基础。

百年砥砺奋进,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禀赋,成就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百年辉煌。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不仅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特质和特征,而且还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智慧。“三史”的协同推进、交相辉映,理论自觉铸就为理论自信,历史自觉升华为文化自信。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两个“相结合”及其历史意蕴

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在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时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⑥在这里,习近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科和学理上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成果,标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性飞跃的基本进程;二是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两个“相结合”的学理依循;三是阐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科的学术意蕴。特别是其中提到的两个“相结合”,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的科学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理依循的凝练。

1943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在对共产国际解散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化趋势的判断时提出:“中国共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7 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 册,第 133 页。
③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 页。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 册,第 47 页。
⑤ 参见《陈独秀文集》第 2 卷,第 258 页。
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3 页。

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实践与中国历史和文化这两个方面“深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原则和根本要求的深刻表述。两个“深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学理依循,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的转化:理论自觉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历史自觉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性。

理论自觉在根本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上的自觉。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进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③“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先导和实践指南,成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依循。

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④,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新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也成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根据。在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邓小平理论写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序言”,确定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续写了这篇大文章接续的精彩篇章。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实际,习近平提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切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升华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历史自觉的必然要求。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就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⑥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一词出自中华典籍《汉书》,《汉书·河间献王传》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出新的理解,提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⑦“实事求是”这一旧典,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表述的独特形态,洋溢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内涵。

---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20 册,第 318—31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02 页。

③ 《毛泽东年谱》第 2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57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⑤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 年第 22 期,第 11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01 页。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进一步运用。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思想,这里提到的“小康”一词,出自中华典籍《诗经》,《诗经 · 大雅》的《民劳》篇吟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千百年来,“小康”或“小康之家”,成为人民群众对殷实而宽裕生活期盼的一种说法。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用“小康”和“小康社会”的说法,标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1984 年 3 月,邓小平指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①邓小平从“中国式的现代化”意义上对“小康社会”的全新探索,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和人民群众对民生的期盼融为一体,使得“小康”这一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意蕴的用语,成为充满着改革开放新时期气息的“新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对新时代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作出多方面的新的探索。

2016 年 5 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然路径。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与思想文化的“转化”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激活中华优秀文化的生命活力,升华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魅力,才能在思想文化形态上融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指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③习近平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真谛。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内在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奋进中积累的文化精粹,蕴藏着中华民族世代奋进聚合的文化力量。习近平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④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力量,再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形态,必将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和亲和力,必将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气质、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增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自觉和自强。习近平提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⑤深刻理解“修身”“齐家”“平天下”古训的时代意蕴,有利于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大德”“公德”“私德”不同层面关联及内涵的感悟,有利于深化社会主义本质等重要理论认识的境界。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4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40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340 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339 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9 页。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多有“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而勇以成之”“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说法。2019 年 3 月,习近平在回答国外友人提出的“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问题时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①习近平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阐释,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深刻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信念,升华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

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要同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就已经显现的方法和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就自觉地把德国全民族优秀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1866 年 2 月,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作最后润色时,马克思满怀激情地同恩格斯谈起:“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②马克思把《资本论》体系结构的成功,看作是对德国科学辉煌成就运用的结果,看作是对德国全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结晶。与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中,从“实事求是”表达的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内涵,到“小康”“小康社会”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愿景,再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阐发的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和信念的意蕴,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昭示的中华优秀文化涵养的再认识等等,使得根植于中华大地的思想文化精华,结合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获得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

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提出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两个“深相结合”的新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提出的学理上的新要求和学术上的新课题。从两个“相结合”上、从两个“相结合”的内在联系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和学理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主题及其阶段性特征

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主题”探索有着重要的学术的和学理的启迪。在学科和学术研究中,要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理论主题以及相应的思想内涵、理论创新和学术意蕴的研究。

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把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的探索,分作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这一“主题”探索中所实现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呈现的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④的特征。这一阶段,中国共

---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4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6 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3 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4 页。

产党在“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依然高度关注中国思想界对工业化问题的探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探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段性特征。

在对中国必然走工业化道路问题的探讨中,恽代英在 1923 年发表的《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对当时思想界存在的“中国不宜工业化”的观点作出批驳。恽代英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议。”但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和国外资本对中国的掠夺,完全阻断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国人之生路俱为外国工业之所压迫而日趋逼狭,于是流为兵匪。在他一方面,既有赔款,复有外债,使国民所担任之赋税日益增高,而上流、中流之阶级亦日呈中落之倾向。此非吾之工业有以与外国相抗衡,盖惟有万劫而不复。岂尚得谓中国不宜工业化乎?”①在这种社会情势下,中国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绝不能由此而认为中国不需要工业化、不需要走工业化道路。1929 年,瞿秋白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经济没有一个独立的前途,而只是在变成帝国主义的完完全全的附庸。只有工农革命的胜利,方才能够解放中国,使他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用极快的速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②

1947 年,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中国实现工业化,是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为根本政治前提和社会条件的。1949 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③,绘制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初的路线图。中国共产党坚守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充分准备。

第二阶段展示的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特征④。新中国成立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写就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新篇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渐次完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1954 年 9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了“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奋斗目标⑤。中国共产党在完成第一大历史任务后,不失时机地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切入,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征程。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夙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成为社会发展的现实。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觉的现实体现。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重要性的论述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以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目标问题,并把实现现代化看作是中国“摆脱落后和贫困”的必由之路,看作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革命

① 《恽代英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0、129 页。
②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 6 卷,第 76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7 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5 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9、350 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2 页。

“目的”的牢固基础。实现国家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任务。

1956 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现代化建设问题提到了国事论衡的重要议程。在当年 4 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系统论述,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当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不仅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且形成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根本任务的思想①,提出了“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②,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战略和方针。次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③的重要思想。

1964 年 12 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告:“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④“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把握,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一页。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战略规划,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动摇过。在 1975 年 1 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宣告:“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⑤

第三阶段彰显的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特征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 年 3 月,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说法”,认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⑦“中国式的现代化”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的历史自觉的高度,展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意义。“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形成,也是邓小平同时提出的“小康社会”的思想基础;“小康社会”则丰富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中国式的现代化”实际上也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断的直接的思想前提。

进入 21 世纪之际,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高度,以深刻的历史自觉和深邃的理论自觉,使“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行并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结为一体。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强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毛泽东同志、他的战友们和千百万革命先烈的伟大理想,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论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⑧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就在于“向着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前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4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4 册,第 248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7 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39 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79 页。
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6 页。
⑦ 《邓小平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2 页。
⑧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0 页。

进,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① 江泽民把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联系起来,从回溯中华民族历史的角度,提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要求,号召广大青年和全国人民一道“向着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前进,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② 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胡锦涛提出:中国共产党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奋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③ 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顽强奋进,以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为主线,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思想主题和理论境界。

第四阶段昭示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的特征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程中,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继续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新的时代内涵,成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目标内涵上,拓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总体发展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课题;在战略规划中,升华了社会全面文明发展“新形态”的境界。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更加卓著的发展目标和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凸显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认识的境界。

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升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和担当。百年砥砺奋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集中体现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为实现这一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⑤这一“历史进程”,在学科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思想精粹和理论主题。

“七一讲话”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所作的阐释,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研究的视界,而且还提出了这一学科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课题和方法指导,对学科的学术和学理发展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

①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6 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第 126 页。

③ 《胡锦涛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60 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7 页。

⑤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7 页。

An Innovative Study on the Theory and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Gu Hailia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significant speech at the Ceremony Mark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pands the horiz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academic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from many aspects, deepens the inner endowment of the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histor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combina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stud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not only create the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but also constantly advance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though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idea of the "two types of combin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s not only a scientific summary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but also the essence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pprehending the practical,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two types of combinations" and the internal connections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and theoretical requirement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ndeavor to develop the country in the centenary is an idea based on th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theme", and ha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academic enlightenment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histor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he discipline and academic research,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 "two types of combination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　管　琴)